

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 编

云冈百年论文选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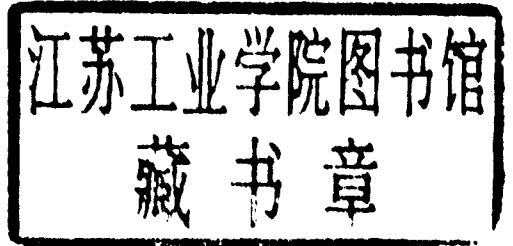
(一)

K879.224-33
2006.1

云冈百年论文选集

(一)

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 编



文物出版社

《云冈百年论文选集》编辑委员会

编委会主任：李治国

委 员：张 焯 黄继忠 李立芬

李雪芹 刘建军 张 华

主 编：李治国

执行主编：李雪芹

封面设计：张希广

责任印制：王少华

责任编辑：段书安

郭维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冈百年论文选集 / 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编著.

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5.7

ISBN 7-5010-1755-7

I. 云… II. 云… III. 云冈石窟 - 研究 - 文集

IV. K879.224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6927 号

云冈百年论文选集 (一、二)

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 编

*

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)

<http://www.wenwu.com>

E-mail: web@wenwu.com

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889 × 1194 1/16 印张：50.25

ISBN 7-5010-1755-7/K · 925

定价：260 元

编者说明

云冈石窟自北魏开创以来，历代史家、学僧、文人多有著述。20世纪初，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和法国汉学家沙畹即发表文章及图片予以介绍。此后，日本学者喜荣仁、关野贞、水野清一、长广敏雄，国内学者陈垣、周一良、梁思成、宿白、阎文儒等先生，先后来云冈进行调查研究，钩沉辑佚，孜孜求索，成就卓越。而今，云冈研究已成为国际学界的一门显学。

将百年来关于云冈研究的重要论著汇辑成册，是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所长久以来的心愿。2005年，适逢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建所50周年，我们将20世纪以来颇具影响的云冈研究论著辑为《云冈百年论文选集》，以展示近一个世纪以来云冈石窟科学保护与研究的概况，亦感念曾经为云冈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中外学人。

为尊重原著者，我们尽最大努力与作者或其家属进行了联系，以祈准允收录其作品。但限于诸多因素，仍有未能取得联系者，谨此致歉并向所有作者表示感谢。

《云冈百年论文选集》拟分一、二卷先行出版，第一卷主要选录云冈石窟研究论著，第二卷主要选录云冈石窟科学保护方面和本所有代表性的文章。我们相信，随着文物事业的蓬勃发展，云冈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必将取得新的成果，这也为我们续编本书奠定了基础。

在编排过程中，为统一体例，我们将注文排到了页下，将插图排到了篇后。因时间仓促，水平有限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敬希读者指正。

2005年6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 | 陈 垣 (1) |
| 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 | 陈 垣 (8) |
|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| 梁思成 林徽音 刘敦桢 (11) |
| 云冈石佛小记 | 周一良 (40) |
| 云冈石窟与域外艺术 | |
| ——佛教美术史中国篇之一节 | 戴蕃豫 (48) |
| 调查云冈造像小记 | 赵邦彦 (62) |
| 《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》校注 | |
| ——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 | 宿 白 (72) |
| 云冈石刻艺术 | 常任侠 (96) |
| 北魏石窟中的“三佛” | 刘慧达 (100) |
| 云冈的历史与艺术 | 郝树侯 (112) |
| 云冈第六窟的佛本行故事雕刻 | 杨 泓 (117) |
| 云冈第五〇窟的造像艺术 | 通 一 董玉祥 (124) |
| 云冈石窟造像中一些题材的考释 | 阎文儒 (133) |
| 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| 宿 白 (147) |
| 云冈石窟的开创和题材的分析 | 阎文儒 (162) |
| 云冈石窟研究三种 | 张畅耕 员海瑞 辛长青 (177) |
| 云冈石窟中的乐器雕刻 | 肖兴华 (188) |
| 关于云冈石窟分期的几个问题 | |
| ——兼与长广敏雄先生商榷 | 丁明夷 (197) |
| 《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》的发现与研究 | |

| | |
|--|---------------|
| ——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| 宿白 (213) |
| 关于云冈石窟的《茹茹造像铭记》 ——兼谈柔然的名号问题 | 周伟洲 (240) |
| 试述河西凉州石窟和云冈石窟的关系 | 秦大树 (246) |
| 云冈石窟开创问题新探 | 陆屹峰 员海瑞 (251) |
| 云冈石窟尼寺考 | 陆屹峰 员海瑞 (255) |
| 焦山、吴官屯调查记 | 丁明夷 李治国 (259) |
| 云冈石窟的雕刻 | 蔡仪 (268) |
| 平城实力的集聚和“云冈模式”的形成与发展 | 宿白 (280) |
| 恒安镇与恒安石窟 ——隋唐时期的大同与云冈 | 宿白 (310) |
| 北魏后期的三壁三龕式窟 | 吕采芷 (319) |
| 龙王庙沟西侧古代遗址清理简报 | 赵曙光 (326) |
| 云冈第二十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 ... | 杭侃 (340) |
| 云冈佛母塔洞的宫闱内秘 | 赵一德 (349) |
| 从犍陀罗到云冈 ——对云冈石窟雕刻艺术表现中有关片断的讨论 | 王恒 (360) |
| 论云冈石窟中瓦顶建筑式样的表现特征及其影响 | 王恒 (374) |
| 关于《水经注》记录云冈之疏证 | 辛长青 (390) |
| 云冈石窟前壁三种类型及其科学性 | 王建舜 (409) |
| 云冈石窟所反映的一些北魏政治社会情状 | 殷宪 (416) |
| 云冈之魂 | 聂还贵 (422) |

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

陈 垣

距京绥路大同站西二十里，左云县云冈堡，有石窟寺，为拓跋氏遗构，盖千四百七十年于兹矣。以比伊阙石窟，尚早五十年。凿山为岩，因岩镌佛，岩高者二百余尺，可受三千许人；佛高者六七十尺，雕饰奇伟，冠于一世。“山堂水殿，烟寺相望”，《水经注》所称赏也。“栉比相连，三十余里”，《续高僧传》所夸许也。徒以远处塞外，交通不便，故好游之士，鲜探其奇。迄今京绥路通，旦夕可至，同人乃以戊午重九前三日，约往游焉。循武州川溯流而上，经观音堂，入武州塞口，则见石壁峭立，绵亘无际。壁多摩崖之碑，文体漫没，犹存廓形。路侧有双钩佛字，高逾寻丈，殆所谓佛字湾者也。至左云县界，则石洞千孔，如来满山，鬼斧神工，震撼耳目。渐近云冈堡，则见绿瓦层楼，依山结构，高出林际，俯瞰晴川者，石佛寺也。据《魏书》，佛应作窟。寺仅三楹，堂奥浅隘。寺僧引入后洞，黑暗异常，佛图四周，巨细不一，灯光隐约，不可辨认，因致疑雕工精美，何取乎黑暗至此。既而登楼一览，始知洞上有洞，本可透光，其所以黑暗者，寺掩之也。寺修于清顺治八年总督佟养量，建筑不得法，故光线不足。像有剥蚀，敷以土垩，尽失原形。金碧辉煌，徒取炫目，泯绝古意。其实寺东西诸窟，有窟无寺，栉比数里者，皆为石窟寺。后人修其一寺，名曰石佛，陋也。其未经修饰诸窟，虽甚剥落，然远望缥缈，容态转真。窟别异形，无有复制。至于裸体神女，振翻凌空，宝相庄严，拈花微笑，则极画像之奇观，尽人工之能事矣！惜乎古洞荒凉，荆榛满目，村民占据，十之七八，衽席炊爨，悉在佛前，断瓦颓垣，横阻挡路。或土埋佛身，已过半膝，或偷凿全体，新留斧痕。过此不图，日即湮灭，是则有司之责也。最可异者，同人遍历二十余窟，无古碑碣，足供考证。即游客题名，亦绝无仅有。寺东有万历年间宣城吴伯羽与游石佛寺刻石，词尚典雅。寺西有佛籁阁匾，寺东有碧霞洞云深处朱廷翰等石刻，皆漫漶单简，不足为典要。以故龙门造像，宇内知名；武州石窟，言者盖寡。同人因为题名而返。余归而神往者久之，乃摭拾群籍，著为斯篇，亦以补金石之缺

略，俾后至者有所考证云尔。同游六人：叶恭绰誉虎，俞人凤翊梧，郑洪年韶觉，翟兆麟瑞符，邵善闾文彪。俞、翟、邵三君，皆京绥路工程师也。一九一八年十月新会陈垣记。

《魏书·显祖纪》：皇兴元年八月丁酉，行幸武州山石窟寺（卷六，时帝年十四）。

史纪魏帝之幸石窟寺，自此始也。皇兴元年，当西历之四百六十七年。前此闻幸武州山，未闻幸石窟寺。《魏书·礼志》，“太宗永兴三年三月，帝祷于武周、车轮二山”是也（武州或作周，通）。永兴三年，当西历之四百十一年，此时未有石窟寺。惟自皇兴元年以后，则帝幸石窟寺，凡七八次，或岁一幸焉，或间岁一幸焉。未知史有阙文否乎，盖常有《魏书》纪者，《北史》无之矣。

抑有奇者，诸帝之幸石窟寺，多在冲幼之年，其殆太后所挟与俱往者乎，不可得知也。

四年十有二月甲辰，幸鹿野苑、石窟寺（卷同上，时帝年十七）。

《高祖纪》：延兴五年五月丁未，幸武州山（卷七上，时帝年九岁）。

此未言幸石窟寺也，然以前后书法例之，则当然幸石窟寺。

太和元年五月乙酉，车驾祈雨于武周山（时帝年十一）。

祈雨未必至石窟寺，然车驾至武周山，则必经石窟寺。今石佛寺左侧，尚有一龙王庙，其殆古之遗制乎？

四年八月戊申，幸武州山石窟寺（时帝年十四，《北史》不纪）。

六年三月辛巳，幸武州山石窟寺（时帝年十六）。

七年五月戊寅朔，幸武州山石窟佛寺（时帝年十七，《北史》不纪）。

八年六月戊辰，武州水泛滥，坏民居舍。

秋七月乙未，行幸方山石窟寺（时帝年十八，《北史》不纪，以上均卷七上）。

方山在今大同县北五十里（据《通志》），有拓跋氏二陵，及方山宫址在焉。此言幸方山石窟寺者，未知方山亦有石窟寺乎，抑幸方山又幸武州山石窟寺乎？以皇兴四年幸鹿野苑、石窟寺之书法例之，则幸方山又幸石窟寺也。然方山既偏北五十里，武州山又偏西二十里，一日而幸二地，不无疑焉。抑方山别有石窟寺，因武州水泛滥后，不幸武州而幸方山乎？

且自是年以后，直至太和十八年迁洛以前，十年之间，不复见帝幸石窟寺。史阙文乎，不可知也。

《肃宗纪》：熙平二年四月乙卯，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，即日还宫（卷九，时帝年八岁）。

伊阙石窟寺，建于孝文迁洛之后。《洛阳伽蓝记》曰：“京南关口有石窟寺灵岩寺”，亦缘武州山石窟寺得名也。自显祖皇兴元年，始幸武州石窟寺；至肃宗熙平二

年，始幸伊阙石窟寺，其间适五十年，则二寺创建之先后，可概见矣。

孝昌二年八月戊寅，帝幸南石窟寺，即日还宫（卷同上，时帝年十七）。

谓伊阙石窟寺为南石窟寺，则武州石窟寺为北石窟寺也。

《出帝平阳王纪》：永熙二年正月己亥，车驾幸崧高石窟灵岩寺（卷十一，时帝年二十四）。

崧高石窟灵岩寺，即伊阙石窟寺，由武州石窟寺得名，见《释老志》、《水经注》及《续高僧传》。

魏帝之幸武州寺，史数数见，而幸伊阙寺只三见，顾何以世人多称伊阙之巨制，而少言武州之伟观？则以伊阙当中原六通四辟之冲，而武州则僻处塞外也。使吾人生铁道未兴之世，亦不易游此。今伊阙寺有陇海路可达，武州寺又有京绥路可达，他日辎轩所及，武州寺之遗碑断碣，为有新得于野老耕氓者。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：太安初，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、浮陁难提等五人，奉佛像三，到京师。皆云，备历西域诸国，见佛影迹及肉髻，外国诸王相承，咸遣工匠，摹写其容，莫能及难提所造者，去十余步，视之炳然，转近转微。又沙勒胡沙门，赴京师致佛钵，并画像迹。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，自中山被命赴京。帝后奉以师礼。昙曜白帝，于京城西武州塞，凿山石壁，开窟五所，镌建佛像各一，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饰奇伟，冠于一世（卷一百十四）。

皇兴中，又构三级石佛图。榱栋楣楹，上下重结，大小皆石，高十丈。镇固巧密，为京华壮观（卷同上）。

武州塞之石窟，始凿于昙曜，据此毫无疑义。昙曜之赴京，在复法之明年，即兴安二年，西历四百五十三年也。是时佛法初复，图像大兴，西域画像，接踵而至。魏之先世，本有凿石为庙之风（见《魏书·礼志》），佛教又重偶像，故能致此奇伟。武州诸像，未识是否为难提等五人所造，然至今石质剥落，间有影迹模糊，近而即之，一若无有，远而睇之，神态宛在者，正与所谓远视炳然，转近转微之说相合，则真足代表五世纪东方美术之一斑也。

景明初，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，准代京灵岩寺石窟，于洛南伊阙山，为高祖、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。初建之始，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。至正始二年中，始出斩山二十三丈。至大长秋卿王质，谓斩山太高，费功难就，奏求下移就平，去地一百尺，南北一百四十尺。永平中，中尹刘腾，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，凡为三所。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，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（卷同上）。

景明在迁洛之后，去复法之岁，约五十年。则伊阙石窟后于武州石窟，亦约五十年。从景明元年（500）至正光四年（523）。其间二十四年，仅造窟三所，已费工如此；武州石窟，奚止三所，则其工程之巨可知矣。

《水经注》灋水条下：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，武州川水又东南流，水侧有石祇洹舍，并诸窟室，比丘尼所居也。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，凿石开山，因岩结构，真容巨壮，世法所希。山堂水殿，烟寺相望，林渊锦镜，缀目新眺。川水又东南流出山。魏《土地记》曰：平城西三十里，武州塞口者也（戴校本卷十三）。

《水经注》撰于后魏太和之世，去石窟寺之建，不过四五十年。其所记载，至可信据。据《魏书》则昙曜所凿者只五所，而此已曰“山堂水殿，烟寺相望”，可知昙曜开山以后，凿者甚聚，皆在酈道元注《水经》以前，而不尽在齐隋以后。又曰“林渊锦镜，缀目新眺”，则当年景色，美丽可想。武州川水自西北来，先经石祇洹舍，则今石佛寺以西诸窟，必有比丘尼所居之遗迹，惜不能指其处矣。其水东转所经之处为灵岩，是灵岩者本地名，有称石窟寺为灵岩寺者，寺因地得名也。

《续高僧传》元魏北台恒安石窟通乐寺沙门释昙曜传：释昙曜，未详何许人也。少出家，摄行坚贞，风鉴闲约。以元魏和平年，任北台昭玄统，绥辑僧众，妙得其心。住恒安石窟通乐寺，即魏帝之所造也。去恒安西北三十里，武州山谷，北面石崖，就而镌之，建立佛寺，名曰灵岩。龕之大者，举高二十余丈，可受三千许人。面别镌像，穷诸巧丽，龕别异状，骇动人神。栴比相连，三十余里。东头僧寺，恒供千人。碑碣见存，未卒陈委。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，司徒崔浩，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，拜为天师。珍敬老氏，虔刘释种，焚毁寺塔。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病疾，方始开悟。帝既心悔，诛夷崔氏。至壬辰年，太武云崩，子文成立（“子”应依《开元释教录》作“孙”），即起塔寺，搜访经典。毁法七载，三宝还兴。曜慨前陵废，欣今重复，以和平三年壬寅（此七字照《开元释教录》加入），故于北台石窟，集诸德僧，对天竺沙门译《付法藏传》并《净土经》，流通后贤，意存无绝（卷一）。

“魏帝所造”，魏文成帝所造也。文成以前塔寺，既为太武所毁，则此灵岩石窟，必为文成复法以后所造，盖即昙曜白帝所造也。曰“东头僧寺，恒供千人”，疑即今石佛寺东之最大石窟，然已荒落不堪矣。既曰通乐，又曰灵岩，则寺非一寺，名非一名，记载缺略，至为可憾。此传成于贞观十九年，当西历之六百四十五年。《古今译经图记》、《开元释教录》、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，均沿用其文。《贞元释教录》成于西历八百年，而于“碑碣见存，未卒陈委”二语，亦复沿用，未识当时碑碣，果否有流传也。清初迄今，不过三百年，而道旁摩崖诸碑，已无一可辨。盖此山之石，松而易泐，不耐风雨，造像犹可，刻碑未见其能永年也。

《大唐内典录》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：元氏之先，北代云中虏也。西晋之乱，有拓跋廬，出居晋楼烦地，晋即封为代王。至廬孙拾翼韃，或言涉珪，魏史云即道武皇帝，魏之太祖也，改号神瑞元年，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，出据朔州东三百里，筑城立邑，号为恒安之都。为苻秦护军，坚败后，乃即真号。生知信佛，兴建大寺。恒安郊西大谷石

壁，皆凿为窟，高十余丈，东西三十里，栉比相连，其数聚矣。“谷东石碑见在，纪其功绩，不可以算也。其碑略云，自魏国所统赉赋，并成石龕，故其规度宏远，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（卷四）。

神瑞元年（414）当晋安帝之义熙十年，非晋孝武太元元年也（376）。其间相去，几四十年。改号神瑞者，是魏太宗，非魏太祖也。其间相去，亦三十年。《大唐内典录》皆误。魏太祖天兴元年（398）。始自云中徙都平城，即今大同县，所谓恒安之都也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，天兴元年，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。太宗践位，始于京邑四方，建立图像。曰京城五级佛图，则郊西石窟寺，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。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，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，亦非绝无影响。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。《释老志》明谓文成复法以后昙曜白帝所凿。魏收北齐人，《魏书·释老志》著于北齐天保元年（550），去后魏之世至近，去昙曜开山之岁，亦不过百年，其言至为可据。

《大唐内典录》撰于麟德元年，当西历之六百六十四年，云谷东石碑见在，此碑当即释道宣撰《续高僧传》时所见之碑。碑称魏国，并言神功久而不朽，则疑非魏碑，或齐隋以后之碑也。惜乎今不可得见矣。

是录与《续高僧传》皆言石窟相连三十余里，以今考之，实无此数，则石窟圯夷者众矣。特未知撰者有信口大言否耳？外人识吾国游记，里数至不足据，此或其一端也。

雍正《朔平府志》古迹：左云县石佛寺，在县东九十里云冈堡，又名佛窑山。传自后魏拓跋氏时，始于神瑞，终于正光，凡七帝，历百十余年，規制甚宏。原寺十所，一曰同升，二曰灵光，三曰镇国，四曰护国，五曰崇福，六曰童子，七曰能仁，八曰华严，九曰天宫，十曰兜率。其中有元载所造石佛二十龕。石窟千孔，佛像万尊，由隋唐历宋元。楼阁层凌，树木蓊郁，俨然为一方胜概。迤东数武，有石窦喷水，清冽可饮，行道多藉焉，题曰石窟寒泉，即四景之“塞泉灵境”也。康熙三十五年冬，圣祖仁皇帝西征回銮幸寺，御书匾额“庄严法相”四字（卷三）。

武州石佛寺，唐以前均称石窟寺，今《山西通志》亦称石窟十寺。曰“始于神瑞，终于正光”，不知何所据？然康熙《通志》已言之，或明志沿《大唐内典录》神瑞元年之说及《魏书·释老志》正光四年之说而云然欤？神瑞之说，辨已见前。正光之说，乃指伊阙石窟，非武州石窟也。十寺之名，亦见康熙《通志》，未知其为魏寺乎，抑隋唐以后所建之寺乎？曰中有“元载所造石佛二十龕”，康熙《通志》作“元载所修石佛十二龕”，雍正《通志》则曰“内有元时石佛二十龕”，光绪《通志》因之。修者修其所本有，造者造其所本无。未知是造乎修乎？元载是否即元时？二十与十二孰当？无可考也。

曰“由隋唐历宋元”者，笔误也。由辽迄金，三百余年，大同朔平，终非宋有，则此中石窟，宋人何尝梦见。

石窟寒泉，或作石窑寒泉。窟窑形近易混。今犹有水涌出，亦在道旁一巨窟中也。

西征回銮者，康熙帝西征厄鲁特噶尔丹回銮，由归化城入口。志称其以十二月初十日次左云县，驻蹕生员范澎宅，十一日幸云冈石佛寺云。今御书匾额犹在。

雍正《朔平府志》载清人题咏甚多，附录如后，以当辘轳之采。

胡文华：游石窟寺

西林天竺迹，春日上方游。片石三千界，微尘四部洲。香花金粟现，钟磬白云悠。俯此群生劫，何缘彼岸舟。

孙鲁：重阳后一日过云冈次曹侍郎韵（曹溶，秀水人，康熙初大同守道）

郊原秋色满山椒，出郭盘崖石蹬遥。峦隐旃檀藏宝相，碑残拓跋纪前朝。雕甍丹雘开金刹，月渚依微涌海潮。披拂霜华寻鹫岭，西风马首上岵尧（此首并见康熙《山西志》卷三十二）。

王仪：石佛寺二首

巉崖暂憩啸临风，却爱空楼望不穷。淡淡湍烟移嶂岫，泠泠倒水出溪虢。碑遗古院神工罕，经晒高台夕梵同。净接青莲天地辟，石床深洞月朦胧。

千仞孤峰百尺楼，云天高并两悠悠。西秦风雨当轩梦，北魏烟岚半偈收。更有寒山之介石，岂无轮海泛虚舟。远鸥独立坡沙浅，分得寻常几点秋。

王度：云冈佛阁

耸峰危阁与天齐，俯瞰尘寰处处低。亿万化身开绝嶂，三千法界作丹梯。乾坤再辟雷初奋，海岳重光月指迷（指西征回銮）。我欲凌虚朝玉陛，好从灵鹫问金泥。

刘士铭：石泉灵境（刘，宛平人，雍正间朔平知府）

崦嵫崇岗远泼蓝，天容树色落寒潭。千寻翠壁云为幔，丈六金身石作龕。在昔鸾旗朝鹫岭，于今水月照瞿昙。灵湫清澈浑如镜，手把龙团望朔南。

赵允烜：云冈石佛寺（赵，闽人）

云冈遥望近莲台，胜概留人去复回。色界有堂皆法相，化身无石不如来。楣题凤篆龙飞额（指康熙御书），梦入金光目绝埃。剞劂料非人力就，昔年端得五丁开。

郑中选：前题和韵

偶然登眺上楼台，苍翠层层至北回。峭壁远从天际削，御书遥自日边来。寒泉清冽多幽致，划石烟笼绝俗埃。不是神灵能效顺，化身亿万那从开？

石碣韵：石佛寺四首

峻嶒龕峇倚云开，县影缤纷天际来。三十二观随处是，石莲浮动现金胎。

荃草原从帝释开，妙同宝月印川来。推开慧海留生面，亿万恒沙结髻胎。

宝宫结构五丁开，金粟飞花匝地来。何处是空何处色，须弥芥子一般胎。

心眼关头不易开，维摩悟后谒飞来。饱参玉版三乘偈，笑指摩尼五色胎。

王达善：寒泉灵境

一脉元从石罅来，湛于秋镜绿于苔。羌人不解煎茶法，下马争分涤酒杯。（以上均见卷十二）

（本篇作于一九一八年十月。载于《东方杂志》第十六卷第二、三号（一九一九年二、三月）。后与日本伊东忠太《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》一文合订出单行本时，又作了修订。今即采此修订本，并加标点符号。）

（摘自《陈垣史学论著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）

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

陈 垣

大同云冈石窟寺自平绥路通后，渐渐有名于世。但游者多注意其建筑之奇伟，雕刻之精美，今特言其译经事业。

云冈石窟寺之创筑者为沙门昙曜，1918年余曾有云冈石窟寺历史论文发表。（《东方杂志》第十六卷第二、三号）昙曜不独为石窟寺开山的创始者，亦为石窟寺译经的创始者。昙曜《续高僧传》有传，他所译者为：

《大吉义神咒经》二卷。

《净度三昧经》一卷。

《付法藏传》四卷。

《大吉义神咒经》，至今犹存。唯《净度三昧经》及《付法藏传》至730年智升撰《开元释教录》时，已称阙本。近年余在敦煌石室所藏经卷中发现有《净度三昧经》两卷：一卷，三纸，卅七行，首五行碎损，所说者系佛为屏沙王说善恶诸报，卷尾题《净度三昧经》卷上。又一卷，十三纸，二百九十四行，首亦碎损，中说：是经一名《断诸苦本》，一名《总持诸法门三昧》，一名《净度三昧》，卷尾题《净度三昧经》卷下。前半为佛化五百美女成男身作沙门，后半与恐惧长者及阿难说戒律及亲近善知识。

此经是否为昙曜译本，未敢断定，然有为昙曜译本之可能。不过与《大唐内典录》及《开元释教录》所载昙曜译《净度三昧经》卷数不符，稍为疑问耳。

《付法藏传》今亦不存；今所存者，为《付法藏因缘传》六卷，亦云冈石窟寺沙门吉迦夜所译。吉迦夜《续高僧传》无传。《开元释教录》称吉迦夜为西域人，“以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（472）为昭玄统沙门昙曜译《大方广十地》等经五部，刘孝标笔受。”据现存大藏经《付法藏因缘传》六卷，题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。可见吉迦夜当时系以昙曜所译者为底本，而从新改译，又在目上加“因缘”二字也。自吉迦夜译本行，而昙曜译本遂废。以今存昙曜译《大吉义神咒经》推之，昙曜所译，较为朴僿，

不如吉迦夜译之文采，亦未可知。此与笔受人极有关，吉迦夜译笔受人为刘孝标，孝标固南朝著名文学家也。

吉迦夜译经，除《付法藏因缘传》外，尚有：

《杂宝藏经》十卷。

《佛说大方广菩萨十地经》一卷。

《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》三卷。

《方便心论》一卷。

诸经今皆流传。唯《杂宝藏经》亦题吉迦夜共昙曜译，其余三种均只称吉迦夜译。吉迦夜事迹不详，唯与他笔受之刘孝标，极可注意。凡曾读过《文选》中《广绝交论》及《辨命论》的，没有不知道刘孝标。刘孝标名峻，以字孝标行，平原人。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皆有传。他既是南朝人，如何会在北魏都城外云冈石窟寺作译经事业，此事说来极有趣，从前人多未注意。

我们若是单据《梁书》，不见得孝标曾做和尚。《梁书》卷五十本传说：“峻生朞月，母携还乡里。宋泰始初，青州陷魏，峻年八岁，为人所略，至中山。中山富人刘实（《南史》作刘宝）愍峻，以束帛赎之，教以书学。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，更徙之桑干。峻好学，家贫，寄人庖下，自课读书，常燎麻炬，终夜不寐。齐永明中，从桑干得还。”所谓宋泰始初者，泰始五年（469）也。泰始五年，为魏皇兴三年。《魏书·献文纪》：皇兴三年“五月，徙青州民于京师”，峻之被徙，当在此时。但《南史》卷四九《峻传》叙此事尤详。《南史》称：峻本名法武，父卒，其母许氏，携峻及其兄法凤还乡里。兄名法凤，则峻本名法虎，《南史》避唐讳，改虎为武也。《南史》又称：峻徙代都，“居贫不自立，与母并出家为尼僧，既而还俗”。是峻曾出家为僧，与吉迦夜译经，当在此时。唯《开元释教录》说吉迦夜译经在延兴二年（472）。以泰始五年八岁推之，延兴二年，峻方十一岁，文学未必甚优。但吉迦夜译经多种，未必一时译成。峻之逃奔江南，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均谓在齐永明中。据《文选·重答刘秣陵沼书》，李善注引峻自序，峻之逃还江南，实在齐永明四年（486）二月，斯时峻已廿五岁矣。八岁被略，至二十五岁，在魏凡十八年。此十八年中，正峻在魏都（今大同）读书及译经时也。《南史》又称峻奔江南后，始“改名峻，字孝标”。其在魏时，名并不显。但今《开元释教录》称孝标不称法武，盖根据《大唐内典录》，《大唐内典录》盖根据道慧《宋齐录》。其所以称孝标不称法武者，盖从孝标改名以后追称之也。

孝标逃还江南后，有两大著述：其一为《世说新语注》，引书一百六十余种，至今士林传诵。其一为《类苑》，一百二十卷，隋唐三志皆著录。南宋末陈氏撰《书录解题》时，始说不存。以今日观之，孝标之注《世说》及撰《类苑》，均受其在云冈石窟寺时所译《杂宝藏经》之影响。印度人说经，喜引典故，南北朝人为文，亦喜引典故。

《杂宝藏经》载印度故事，《世说》及《类苑》载中国故事。当时谈佛教故事者，多取材于《杂宝藏经》，谈中国故事者，多取材于《世说新语注》及《类苑》，实一时风尚。《南史》称：梁武帝每集文士，策经史事，加其赏赉。曾策“锦被”事，咸言已罄。帝试呼问峻；峻请纸笔，疏十余事，坐客皆惊。及峻《类苑》成，帝即命诸学士撰《华林遍略》以高之。其博洽见忌如此。其根底全植于云冈石窟寺为沙门时也。

或疑孝标在魏都，虽有十八年，然魏都文化并不高，孝标虽勤，何从得书。不知魏时文化虽甚鄙野，然孝标被略至魏，正魏孝文振兴文教之时，中原图籍，必渐搜集，云冈石窟寺新建，梵漠经典，正好贮藏。以今吉迦夜与孝标所译诸经无一不存之例例之，则古刹保存经籍之功实大。

云冈石窟寺今虽荒僻，然铁路未通时，其荒僻较今日何止十倍。故云冈虽有冠绝一时之雕刻，然见于文人题咏者绝少：《全唐诗》中，仅有宋昱一诗（第二函第七册）。直到明万历末年（1620）。始有吴伯与一诗，今刻石窟寺西阶下。又到清朝，然后有朱彝尊、曹溶、胡天游等，或因游宦，或因游幕，偶然至此题咏。胡天游诗有“野客定难携屐到，山禽犹自恋人啼”之句（见道光《大同县志》二十），其荒凉景况如此，想不到北魏在恒安建都时，云冈之热闹又如彼也。然则文人之到云冈者，实以刘孝标为第一人，注《水经》之酈道元当为第二人，其著作皆有名于后世。可惜《杂宝藏经》能因佛藏而存，而《类苑》不能借佛藏而存也。

孝标之卒，据《南史》在梁普通三年（522），年六十。据《梁书》为普通二年。以泰始五年（469）八岁推之，孝标当生于宋大明六年（462），六十岁当为普通二年，而三年字误也。

与昙曜同时同地译经者，尚有沙门昙靖，所译有《提谓波利经》二卷，《大唐内典录》尚著录；以不为世所推重，故早已不存。《提谓波利经》外又有《提谓经》一卷，亦经昙靖点窜，隋时民间盛行，故昙靖之名，唐初《续高僧传》以附《昙曜传》，而吉迦夜名反不著，不可谓非《续高僧传》一时之疏略也。

（本篇系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在燕京大学校舍落成典礼上宣读之论文，亦载于《燕京学报》第六期）

（摘自《陈垣史学论著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）

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

梁思成 林徽音 刘敦桢

绪 言

1933年9月间，营造学社同人，趁着到大同测绘辽金遗建华严寺、善化寺等之便，决定附带到云冈去游览，考察数日。

云冈灵岩石窟寺，为中国早期佛教史迹壮观。因天然的形势，在绵亘峭立的岩壁上，凿造龕像建立寺宇，动伟大的工程，如《水经注》灞水条所述“……凿石开山，因岩结构，真容巨壮，世法所希，山堂水殿，烟寺相望，……”又如《续高僧传》中所描写的“……面别镌像，穷诸巧丽，龕别异状，骇动人神……”则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——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。

但是或因两个极简单的原因，这云冈石窟的雕刻，除掉其在宗教意义上，频受人民香火，偶遭帝王巡幸礼拜外，十数世纪来直到近三十余年前，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，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。

我们所疑心的几个简单的原因，第一个浅而易见的，自是地处偏僻，交通不便。第二个原因，或是因为云冈石窟诸刻中，没有文字。窟外或崖壁上即使有，如《续高僧传》中所称之碑碣，却早已漫没不存痕迹，所以在这偏重碑拓文字的中国金石学界里，便引不起什么注意。第三个原因，是士大夫阶级好排斥异端，如朱彝尊的《云冈石佛记》，即其一例，宜其湮没千余年，不为通儒硕学所称道。

近人中，最早得见石窟，并且认识其在艺术史方面的价值和地位；发表文章；记载其雕饰形状；考据其兴造年代的，当推日人伊东^①，和新会陈援庵先生^②，此后专家作

① 伊东忠太：《北清建筑调查报告》，《建筑杂志》第189号；其还著有《支那建筑史》。

② 陈垣：《山西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记》。